

40 `50年代中国乡土小说中“城”的退隐与“乡”的凸显

朱凌*

目 录

- 一. 引言
- 二. 启蒙视角的下移——呈现民间的姿态
- 三. 冲天的干劲——乡村的真实图景
- 四. 被规约的城与乡的“乡村”
- 五. 结语

一、引言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民间”¹⁾的生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在对“五四”初期

* 山东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该文选自2016年山东省社科联年度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6-ZZ-WX-07)。

1) 何谓“民间”？在语义学的视阈内，中西方对“民间”的理解有很多共同之处。英语中的相对应的词为“Folk”（有时也为“popular”或“civil”），“Folk”多见于一些复合字中，它起着修饰的作用，如“Folkdance”、“Folk”等，中文也“有”类似的情况，《辞海》中并未收“民间”一词，而收录了“民间工艺”、“民间文学”予以解释。与英文“Folk”释义相似，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民间”被定义为“人民中间或非官方的”。可见，中、英文的“民间”——“Folk”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意义模糊的术语。然而，对这一所指模糊的概念进行客观的考察，可以发现，“民间”所指的是一个原为广大的社会空间，一个普通民众（“民”）生活和活动与其中的巨大世界。“民间”并非一种人群的范畴，相反，它本身即包含了一种社会的观念，在这一意义上，它所指称的可以是一个有别于“国家”的“社会”。其根据是因为“民”的原始意义和基本意义之一即是“人民”、“民众”，尤指与官相对的普通民众。这种界分本身即暗含了某种区别性的空间概念，这一点因为“间”字的引入而变得更加清楚。“间”字在“民”的概念上加入了一重社会性空间的重要含义，因而建构了一个具有空间含义的“民”的概念，令普通民众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变得清晰可见。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民众依据其熟悉的生活方式，追求他们各自不同的利益，彼此结成这样或者那样的社会组织，如宗族、行会、村社、宗教会社和

“平民文学”、20年代“普罗文学”、30年代“大众文艺”的倡导中，“民间”作为一个多元化可阐释概念进入过知识分子的视野。但是一切话题都是在知识分子精英化视野中审视并提出，并没有真正顾及人民大众。因此，“民间”不能够真正地融入知识分子视界，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也不可能生存于“民间”。40年代的战争唤起了民众的力量，知识分子更加清楚地感受到“民间”的力量，他们逐渐将“民间”纳入文学创作的视野。周扬认为：“五四的否定传统旧形式，正是肯定民间的旧形式；当时正是以民间旧形式作为白话文学之先行的资料和基础。”²⁾周扬对“民间形式”的肯定，是对政治意识形态规约下的“民间”的认同。也就是说，“民间”已不再是纯粹的民间，它要求知识分子对“民间”的认同实际上是对“民间”所承担的现实斗争任务的认同。它要求知识分子放弃持有的精神立场与民众结合。“民间”（包括民歌、快板、说书、旧戏、章回小说等形式）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逐渐摆脱了原本真状态，增添了非文艺（特别是非审美本身）所要求的社会功能、文化效应和政治价值。从40年代以来的政治环境来看，文艺界有责任对“大众”进行革命宣传与鼓励。通俗化、大众化或“旧瓶装新酒”这些对“民间形式”的利用方法都成为这个时期被关注的问题。在历史发展、现实要求、文学价值的多重参照下，毛泽东《讲话》中对“民间”利于“大众化”的价值有更为深刻的阐释。《讲话》中有明确的政治革命立场，它要求文艺为抗

秘密会社等。从学理的维面，中西方对“民间”概念的理解存有很大的差异。在西方民俗学的视野里，“民间”中的“民”被不同的学派界定为乡民、种族甚至“野蛮人”。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方民俗学还处于萌芽时期，学者们关注的是“新大陆”中“未开化”的“野蛮人”的习俗。在反观“文明”自身时，他们将研究视野放到了离本土较偏远地区，掌管古俗的乡民成为研究的对象，尽管神话学派关注的“民”实为“种族”，人类学派关心进化上的落伍者即本土上的农民和异域的“野蛮人”，但是人们仍然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者们大多按照所属的地域来确定研究对象。总体说来，从空间范围来看，西方所谓的“民间”等同于“乡间”及其“乡民”，尤其在西方的民族复兴运动中便是如此。当代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则把“民间”界定为任何人组成的任何“民群”，“民间”（Folk）的概念已不再局限于农民或无产者。所有的人群——无论其民族、宗教、职业如何，都可以构成一个独特的民间。并具有值得研究的相应的民俗。”（阿兰·邓迪斯著：世界民俗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页。）

2) 周扬著：对旧形式利用的文学上的一个看法，选自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战、为工农兵大众服务；从文学史的书写来看，《讲话》是以政治权力的方式，规约着“民间”的全部形式。可以这么说，《讲话》对“民间”干涉的强大的政治之力，“大众化”也是这种政治之力对“民间”的完全塑造。

在时代之音对“民间”的诉求中，启蒙视角自动下沉，“乡村”成为作家们表达“民间”理想的最佳场域。40年代解放区作家们深入“民间”，对“乡村”做出具体展示。在启蒙视角下被关注的“乡村”是一个加注了精神寄托和启蒙理想的想象空间，它可以是蒙昧未脱的土地，革命斗争的场所或是表达遥远的文化怀乡，却无论如何成就不了真实的“乡村世界”。只有当时代的语音强有力地关注到“民间”，知识分子（作家们）放弃启蒙的精英姿态，才能够真实地呈现农民的心理世界和日常生活状态，将“乡村”真正纳入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

二、冲天的干劲——乡村的真实图景

这个时代乡村题材小说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现了中国乡村的真实生存面貌，从多方面描绘了乡村世界。

第一，乡村自然景观的展示。虽然在40、50年代乡村小说的描写中没有大篇幅的风光景物描写，但是乡村的一些自然风土景致在文字中是时而闪现的。赵树理的小说以晋东南乡村为描写对象，他通过描绘极具地方特色的风光地貌、风俗人情以及方言等生动地展现了太行山区农村生活面貌。但纵观赵树理的小说，风景描写通常是被忽略的。统计他的代表作品，如《登记》、《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锻炼锻炼”》等几乎通篇无景。而少数涉及风貌的长篇小说也是对地形地貌、地理位置的客观简介，如《三里湾》中对山区地势起伏变化的描述，《灵泉洞》中对其地理位置的介绍等。因此，赵树理的自然景致的描写，一般是写实性的介绍，是根据故事情节叙述的需要描写的，其作用并不是大幅度的渲染和烘托，也很少有象征和想象，多为当地乡土特色加以点缀之用。赵树理的小说中的风景描写并不是刻意的审美评价，而是以农民

的视角欣赏着养活自己的土地和乡情。作家和农民站在同一立场来品味乡土风味和地域人情。赵树理创作中更多的是倚重对乡约民俗的刻画和书写。赵树理对乡土文化的表现和审美倾向于时代话语宣传的“大众化”目标，他放弃了高高在上的精英化视角，以农民的审美心里和审美乐趣作为视角和方向。可以想见，真正的农民（尤其是40、50年代的农民）是没有闲暇单纯的欣赏田野的风景，那一片片绿色的麦浪，是他们生存的全部希望，那一间间土坯或者瓦房也是他们生活转台和生存质量的真实写照。因此，赵树理并没有真正属意于描绘田园风光，借以抒情或感怀，这明显不是那个时代农民可以做的事情。他们的情感关怀、喜怒哀乐只能蕴藏在日常的田间劳动和家常琐事中。赵树理以喜剧的腔调展现了晋东南独特的乡土风味和乡村图景，这是与众不同的。

第二，农民形象的塑造。“人物”是乡村世界中最具精彩的表达。40年代乡村小说中的农民形象应该说是文学史以来最丰满、最富性格和激情的书写。人物形象的塑造可以说是这个时期乡村世界中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然而，这种真实的描写和刻画必定和作家与乡村沟通的角度和方式相关。赵树理的“民间”创作角度和立场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赵树理塑造人物形象并不是从当时流行的政治话语的表达方式分阶级虚构乡村中农民的形象特点，展现新的代表乡村社会发展力量怎样去改造社会，而是农民的视角、感觉、印象、判断为立场，根据农民的思维方式去表现农民的思想感情及在新的社会转型中的变化，表现以乡村中生活的人们为主体的乡村民间文化生态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的展开中塑造这个时代的人物特点。因此，赵树理的“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明显的特点是以“平视”的视角展开叙述的，包括对农民心理、行为以及转型期社会变革的描写，它主要叙述点立足于“农民”自身，“农民”是绝对的主语，表现的是农民如何在当代意识形态中的“转变”，这个转变不仅仅包含迎合当下时代话语的思想转变，也包含了丰富、复杂与生动的民间文化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交融与转换。1958年创作的小说《“锻炼锻炼”》中民间文化形态的审美特征就在两种思想的交锋中显现出来。很明显的，“小腿疼”和“吃不饱”这样的老式农村妇女，是与时代宣传话语精神相悖的典型，成为受批判、受

嘲弄的对象，失去了人格的存在意义。赵树理在塑造这类人物时，是十分矛盾的，以赵树理一贯的创作立场，他应该从农民的情感、诉求出发来沟通与国家权力意志的关系，而在这部小说中创作立场屈从了。而在这些所谓的“落后人物”身上仍然保存着民间的愿望和趣味，这正是“落后人物”比“高大全人物”更生动、更有艺术魅力。正如陈思和所言：“毫无疑问，来自解放区作家们都是自觉的国家意志的体现者和传播者，但同时，他们中间确实有不少人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与人民群众保持了血肉相连的精神联系，并能够自觉将艺术追求融入民间文化形态，使他们在艺术创作时不自觉地向民间文化形态倾斜，流露出民间的真实声音。”³⁾

第三，各种复杂的乡约礼俗和各种社会关系展现出复杂的乡村精神世界。乡村的亲缘和人际关系，如父子、祖孙关系（《创业史》、《铁木前传》、《盖满爹》），母女、婆媳关系（《三里湾》、《登记》、《小二黑结婚》），夫妻、恋爱关系（《山乡巨变》、《李双双》、《结婚》），邻居、亲戚关系（《新认识的伙伴》）等，在各种作品中都有所表现。⁴⁾农民与国家制度、各级官员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关系，在《“锻炼锻炼”》、《水滴石穿》、《赖大嫂》、《宋老大进城》等作品中有明确的表达。农民与他们所挚爱的土地之间的文化亲缘关系和密切的情感依存关系。《“锻炼锻炼”》中干群关系，群体意识等。《“锻炼锻炼”》中，赵树理描述“小腿疼”是“高兴时候不疼，不高兴了就疼”；她爱占小便宜，其名言是“拾东西全凭偷，光凭拾能有多大出息”。赵树理对她进行描述时赋予她生存环境带来的人性之病与美学之丑——一个得理不饶人、没理闹三分的农村妇女。杨小四给小腿疼出大字报，又设计让小腿疼的自私自利思想彻底暴露，不符合乡村社会脉脉乡里温情，但它却大体符合乡间的日常生活伦理：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是否占理和讲理，实际是乡村日常生活中最高的伦理评判尺度，也是赵树理小说中经常思考的问题。

第四，40、5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表达了对乡村未来世界的理想和关切——代

3) 陈思和著：《中国当代文学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4页。

4) 刘洪涛，《周立波：民间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

表革新的“归来者”形象塑造。《创业史》中对徐改霞去面临选择的困惑，蕴涵着作者对乡村青年出路问题的关切和思考。此外，赵树理、孙犁等作家还塑造了一些乡村青年形象，展现了他们的成长轨迹，也寄托着作家们对乡村未来的关怀和期待。这个时代，作家对农民的关注与对乡村整体面貌和生活质量的关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作家们也在思考乡村现代化的未来和青年人的作用：乡村面貌的改变急需知识青年们的参与，但获取知识又是乡村人改变自身命运的最重要途径，有了知识就离开乡村成为农民们首要选择。在个人与集体的对弈中，作家们对乡村知识青年的态度也出现明显的分化：对青年力量离别乡土，作家们表示出谴责或褒扬的态度。赵树理在《卖烟叶》等作品中他严厉批评了那些想走出乡村的知识分子，而在《三里湾》中，对回乡知识分子范灵芝和马有翼的态度则明显包容和赞赏，也肯定青年人在乡村建设中的力量，“在办社工作中还有一种新生力量是青年学生。这些人，不一定生在贫农家庭，自己对农业生产也很生疏，然而他们有不产生于农村的普通的科学、文化知识（例如中国、世界、历史、社会、科学等观念），有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很少有，甚而没有一般农民传统的缺点。”⁵⁾李准《耕耘记》塑造了自学成才的乡村女青年萧淑英，马烽《韩梅梅》也传达了对“能写会算”的知识青年回乡务农的恳切心情。这些作品中，蕴涵了作家们变革乡村面貌的急切心态。

三、被规约的城与乡的“乡村”

“十七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过渡的重要的承前启后的阶段，各种制度和思想都处于现代化变革的重要结点。“十七年”文学继承了“五四”时代的启蒙传统，也存在着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民的精神特征。农村题材小说是“十七年”文学最具表现力和存在感的组成部分，描写了中国最广大的农村革命的景象，书写了农民的过去和现在。现代文坛中的乡土小说由五四启蒙文学演变分

5) 赵树理著：《三里湾》写作前后，选自《文艺报》1955年第19期。

化而来，大概发轫于鲁迅，30、40年代，融入了左翼革命因子，乡土作品中开始将革命的情绪和思想融入农村社会，激发农民的革命激情。随着时代的推进，革命的情绪和斗争的实践在乡村社会蔓延开来，构成了农村社会新的客观现实，特别是40年代以延安革命根据地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的方针延续了毛泽东《讲话》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方针，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创作中也延续了延安文艺的传统，遵循着“大众化”的革命创作传统。同时，中国的乡土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兄弟们翻身解放，对“乡村”的书写成为当下文坛最重要的支柱。在时代的转型期文学与政治、文化制度密切相关，都是围绕着政治、文化体制组织和书写，那么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一直充斥在文艺界。

（一）城市参与下的“乡”的凸显和建设

乡村和城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新中国成立后，时代的激烈变革激发了作家们对“乡村”的想象，“十七年”关于“乡村”的描写大部分洋溢着建设美好生活的冲天干劲和对新生活喜气洋洋的憧憬，这个时期的“乡村”基本摆脱了农村生活的灾难和艰辛的描述。很大程度上，时代的“乡村之变”是“进城”后的知识分子在对时代之音（政治需要）的应和中完成的，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后出现的一系列变化的想象和描述。因此，在城与乡之间存在着想象的误差。城市退却到乡村的背后，若隐若现的，在乡村中可以透视出城市的身影，却不见城市真实的影像。乡村的形象则是直面的、高大的、喜悦的，充满着欣然地笑意。

1950年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城乡隔离制度，旨在防止农民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就地消化政策、户籍以及粮油供给制度等，以此来保证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保障城市居民生活的稳定。这些政策和制度将“乡村”和“城市”划分成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根据国家意志希望农民能够扎根农村，但是在城市的映衬下，当时农村艰苦的生活条件却让部分农民脚踏土地的贫瘠，眼望城市的繁华，“农

民进城”成为农民（特别是有了一定知识的农民）的理想。由于时代语境的规约，对城市的向往就是对农村的“背叛”，这种理想但在此时的作品中往往被否定，只有像萧长春、焦淑红这样不怕农村艰苦的农村知识青年才是作家认为正确的意识和行为。这个时代作家对城市文明总是尽力“抹黑”，却也不能排除另一个层面上农村对城市文明的向往。城乡关系在建国后出现了一个历时性演变，“十七年”的抑城扬乡，80年代贬乡褒城，90年代对城乡则出现了多元共存的评价话语。农村的贫苦、艰难，与城市的富裕和繁华形成了鲜明对比，城乡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差别。作家们在描述城乡文明差别方面，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40年代大部分的作家在作品中没有描述城市文明的积极作用，反而是乡土文化解决城市生活的各种弊病。到了50年代，城市人下乡往往是被动的，到了乡村，也被农民的优秀品质所浸染；农村人进城却不同，农民积极地向城市进发，将城市作为终极人生理想，但在城市中又缺乏精神的认同，缺乏归属感，往往被以“他者”或“异乡人”的被排斥，遭遇了生活上窘迫和精神上的疏离的尴尬境遇。但是，这一时期的农村已然成为了阶级斗争争夺的关键领域，城乡的差距此时被这个时代所崇尚的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声音所湮没。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城乡之间的价值选择是以意识形态意义来界定的，农村与城市的矛盾不仅仅体现在作家明显地对抑城重乡的表述上，还体现在对农村生活劳动的艰辛的忽视甚至美化上。就如董之林所言：它们都拥有一种浪漫气质，用高昂的理想和热情鼓励着当时的社会，塑造了一代青年的人生，并构成现代文学向当代演化过程中的历史环节。笔者认为这种浪漫气质确实存在，具象化在对于农村劳动场景的抒情化描述上——只要是对集体对合作社有利的活动，就算是劳动、疲惫和困苦都是浪漫的。像焦淑红的团支部看麦子种树的劳动场景，是在年轻人之间的嬉笑打闹中轻松度过的，他们的冲天干劲和热情，为劳动场景增添了不少浪漫情怀。⁶⁾——“这时候，正是一天最好的时刻，太阳把全部的光辉都献出来了，献给了正在孕育着丰收的大地，献给了正在创造丰收的人们。田野上，男女社员们正在挥汗劳动，拔草的，锄地的，每块地都有人：萧老大正

6) 董之林著：无法还原的历史——“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症结，学术月刊，2007(6)。

赶着套在水车上的老牛，苗圃里的年轻人正给小树苗施化肥，山上云彩一般的羊群漫游着，河边，韩德大哄赶着黄牛、花牛在荒滩上寻找鲜嫩的青草……街上，不断地有人来往，焦振丛赶着大车回来了，韩百旺又把第二锅豆片挑出大庙；大庙里，焦振茂耍了光膀，跟韩百安扯着大锯，锯末像雪花般地飘飘扬扬……⁷⁾这段描写细述了劳动场面，让人只感受到和谐自然的生态场景和人们欢快的劳动心情，一点也感觉不到农村劳作的艰辛和无趣。韩梅梅说“那几天正好有月亮，我每晚一边和他们劳动，一边教他们唱歌，大家又说又笑，干得很起劲。开头几天，只是男团员们，后来人越来越多，连一些年轻姑娘们也参加了。大家一连干了五个晚上，把圈里的脏东西都挑到村边的粪坑里……”⁸⁾作品中没有农村生活的艰辛，也与我们对老一辈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想象已经完全不同，当然，这个时期农民确实充满激情和统一，他们充满了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信心和对未来美好新生活的热切期待，有高昂的战斗情绪是非常合理的。此时，作家为我们营造的社会主义背景下改革中的农村面貌，是现实和理想的交汇，对城市的排斥和对农村的褒扬体现了对农民和农村新面貌的期待和向往。

(二) 关于“乡村”的想象与现实

毛泽东《讲话》思维体系的确立“从根本该是一种现代性话语——一种和西方现代话语有着密切关联，却被深刻地中国化了的现代性话语。”所谓“中国化了的现代性”本身就存在着双重含义：“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对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为标志的种种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反对以工具理性做支持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以及与这体制密切相关的现代政治、法律制度，反对在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前提下形成的种种对人的支配地位；另一方面，主张民族独立以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主张在传统和现

7) 浩然著：《艳阳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405页。

8) 马烽著：《韩梅梅》，选自《山药蛋派作品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239页。

代二分的前提下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主张大规模的城市化以消灭‘城乡差别’，主张大跃进、‘超英赶美’的高度工业化并且赞美机械化、自动化的物质技术，主张建立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有效的国家机器以实现社会的组织化等等。”赵树理一方面积极迎合着《讲话》中“现代性”。另一方面，赵树理向“传统”元素的借鉴过程越来越多的体现了“现代性”的另一面：自由意识和个性化的表达。在今天看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对“五四”现代性的延续，是对解放区左翼传统语境下“现代性”拓展。赵树理吸收了传统文化精神中自由的审美价值，经过“五四”理性的升华之后，赵树理将乡村审美的自由天性导向救亡的功能上面，将价值归宿指向对自由、民主以及深藏于审美领域后的人的个体关注。⁹⁾延安文艺不仅使“大众”作为政治力量和历史主体得到的具体的浮现，而且因为“这场运动隐约地反衬出对以现代城市为具体象征的市场经济方式的一种集体性抵抗意识，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感性分离’、价值与意义的分割所催发的无机生存下的意识恐慌和否定。”在唐小兵的论述中，延安文艺所反对的现代化形态是一种资本主义式的“社会分层以及市场的交换——消费原则。”¹⁰⁾“我们从那一时期的作品所领略的决非生活平庸的原貌，而是经过了作家对新社会浪漫的想象。”¹¹⁾

伴随着政治权力和知识权力话语的植入，40、50年代文学作品中现实和想象存在不和谐的现象。文学承载着对农村社会生活和工作的指导作用，并且将引导农民思想的功效置于高地。但是作家对乡村生活的想象在作品的实际描写中无处不在的渗透着——1.作家的社会理想体现在对未来乡村生活的美好设想上，希望乡村迅速成长为适应国家建设速度的理想的乡村。2.显然，对乡村归来的知识分子形象的设置是理想化的，英雄化的。3.作家心目中的对理想农民，无论是“外来”的还是长期生活在乡村的，都没从根本上理解农民（特别是农村青年）精神上的迷惘和他们“走进城市”的想法，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重国家轻个人，个人精神为轻而政策制度为重的情况。文学理想化的倾向，揭示了历史重新结

9) 李陀著，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今天1993(3)。

10) 唐小兵著：我们怎样想象历史，再解读（代导言），第16-19页。

11) 董之林著：旧梦新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构的可能。

40、50年代文学演绎中，随着“解放区文学”政治意识形态的确定和强化，乡村不再被排斥于“现代”之外，作为愚昧与落后的象征，也不是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笔下远离现代文明的世外桃源。从文学的“乡村”到现实的“农村”的转变，阶级斗争的色彩越来越浓，“现代”的界定在农村和城市之间被刻意模糊了。“农村”在这个年代文学经典的表述中被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被置换成革命与反动，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功能论下，作者借文学创作来阐释当时的时代政治问题，如农村阶级路线斗争、农民的出路和走向等。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言者浩然，曾说“首先是一个党员，其次才是一个作家。”他的作品是“写农民，给农民写”，但随着政治理念的不断强化，到写作《金光大道》时，文学理念变成了“写政策路线，给党写”。另外，“丁玲可以说是当年左翼作家中最有小说写作才能的”，但她到了延安以后，则成为积极响应新时代延安精神召唤的作家。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到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到后来的“三红一创”（即《红旗谱》、《红日》、《红岩》和《创业史》）与《青春之歌》等，虽然这一系列作品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写出了作家对生活的感受和体悟，但是它们都没有摆脱当时政治生活对作家的制约和影响。¹²⁾因而，这导致了对乡村生活常态和真实面貌在文化经验与文学想象的双重遮蔽。另外，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们在其作品中，如《三年早知道》、《宋老大进城》、《赖大嫂》中，关注的是“共产主义道德”问题，重点是“教育农民”而不是“批判农民”。因此，“十七年”文学离开了“城/乡”对立的结构视角的参照，使文学表现乡村落后于城市或者说农民滞后性因素被搁浅，农村的现实情境没有得到全面的原生态的反映，所以赵树理表述，他在“文革十年”期间“几乎没有写什么，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只好不写。”¹³⁾

二十世纪50年代的乡土小说承接了解放区小说的创作传统和方向。城市只能

12) 丁东等著:思想操练,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年, 第313页。

13) 董大中著:赵树理年谱,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2年。

无辜的暂告“退却”，“农村”却在“政治视角”位居叙事视角的主导地位中渐渐被凸显出来。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论》中提到，50年代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是作家们在面对新生活新事物面前急于寻觅新鲜而重大的题材，放弃了风俗画的描写所做的尝试，这样的举措导致了其艺术生命力的衰竭。农村题材小说是作家们在面对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些新事物的情况下，不仅仅放弃了风俗画的描写，并且通过文学想像加强并夸大了农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对改变农村经济生活与物质生活现状的承诺，结果是用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幻象图景遮蔽住了生活中的艰苦，在这类小说的文学想象中，意识形态的终极承诺是否兑现、怎样兑现、何时兑现已无人顾及，这就出现了理想与现实的脱节，作家也陷入了更为宏大的群体中，产出了很多缺乏“个性”的作品，却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审查群体与个体之间纷争、政治与审美矛盾的文学时代。¹⁴⁾

(三) “现实主义”的抗争

关于当代农村的想象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到1959年，乡村世界是作家从静态的考察和回忆中描绘出来的，作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现实主义白描的主观意愿，突出了“本土”的体验和感受，这一点从赵树理的小说中表现十分明确。许多文献资料中都曾指出“赵树理是位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赵树理对现实主义的精神的坚守应该与当时中共文艺政策对“现实主义”的界定相一致。然而，赵树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与“十七年”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阐释话语的转折与变迁是相冲突的。赵树理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体现在他清晰而准确地、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我们党所领导的、农民群众进行的“改变农村的面貌，改变中国的面貌，同时也改变农民自己的面貌”的伟大的历史斗争，¹⁵⁾就这一点而言，他与解放区文艺界对“现实主义”所反映的内容又是相符合的。

14) 丁帆著：《中国乡土小说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6-257页。

15) 周扬著：《论赵树理的创作》，选自《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讲话》之后到建国前后，文艺界对“现实主义”的界定也日益鲜明。它逐渐剔除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中与党的文艺政策不相符的内容，提纯出反映“新生活、新面貌”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式。建国初期发生的“《金锁》事件”体现了赵树理与对“现实主义”规约的冲突。赵树理编辑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时，于1950年第三期和第四期上，连载了孟淑池的小说《金锁》。小说发表后，不仅作家作品遭到批评，作为该稿签发人的赵树理为此作了两次检讨：一次《〈金锁〉发表前后》，发表于《文艺报》第2卷第5期；另一次《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发表于同年七月出版的《文艺报》第2卷第8期。1950年《说说唱唱》第7期上发表的“本刊编委会”的《半年来编辑，工作检讨》中又一次检讨了这部小说，并附上赵树理的两篇检讨文字。“《金锁》事件”在当代文坛上，算不得什么大事，事过境迁也鲜有人提及。但是，这个小事件却显示了赵树理创作中坚守的现实主义原则与当时文艺政策的不相容性。《金锁》事件争论的焦点是小说是否歪曲了农民的形象。批评者的指责集中在小说歪曲了农民形象这一点上，如邓友梅认为“真正的劳动群众是正直的、有骨气的、敢于反抗的(当作一个正面人物，又是在一个时代转换的环境中，是应该写成正直的，有骨气的，敢于反抗的。——《文艺报》编者)，决不是象作者写成的那样一个会拍会溜的脓包，作者在这里是歪曲了金锁这个人的(不如说：歪曲了劳动人民的性格。——《文艺报》编者)，这篇小说看不到金锁有什么反抗对地主有什么憎恨有的只是对地主的羡慕，……使读者看了以后，觉得一个要压迫人，一个愿受压迫，好，两相情愿，还有什么觉悟可谈呢？”于是得出结论：“首先是人物不真实，因此也影响了主题，甚至在某些地方诬蔑了劳动人民。”这正是赵树理“朴素”真实表现生活原生态的“现实主义”与政策规约的“现实主义”的冲突。其实，赵树理对于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一直是坚守的，即他坚持反映农村社会中最原始、最本真的生活面貌，把“亲历”、“经验”视为最重要的因素。经过无数次提纯，“革命现实主义”逐渐成为党的文艺政策对“现实主义”规约的产物。赵树理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不能够适应一次次被提纯后的“革命现实主义”原则对现实生活及生活中的人物的无限夸大及英雄化、完美化的塑造。赵树理对现

现实主义原则的坚守体现于对一系列人物形象丰富性的塑造上，特别是对一系列落后人物的塑造。例如，由于迷信而闹出不少笑话的“二诸葛”，装神弄鬼、自私自利、贪图享乐的“三仙姑”(《小二黑结婚》)；被封建说教哄骗而心甘情愿受欺压的老秦(《李有才板话》)，胆小怕事，凡事总要“看看再说”的聚财(《邪不压正》)；还有一些“狗腿子”形象，“跟着恒元舌头转”的“吃烙饼干部”张得贵(《李有才板话》)、“穿黑衣保黑主”的王忠(《小经理》)和为虎作张，见风使舵的小旦(《邪不压正》)等，真是形形色色，应有尽有。而这些以“现实主义”原则创作的性格丰满、形象完整、个性鲜明的人物是不能被“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所接受的。林默涵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从阿Q到福贵》¹⁶⁾的文章，文章指出：“我们从阿Q和福贵身上，正可以看到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怎样巨大的变化。”这是对以“五四”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与赵树理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塑造的人物形象的肯定。这与“《金锁》事件”中的一系列评价是有冲突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建国前后文艺界对现实主义创作规约的的转折，以及赵树理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构成与50年代文艺界确认的新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体系的差异。

赵树理在农村长期生活、观察而得到的农村生活经验和“底层视角”的表达方式以及他坚守的“朴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立场，成为赵树理文学创作中一贯坚持的原则。然而，这种“朴实的现实主义”本能地疏离于以“宣传”为目的的功利现实主义，也与所谓革命的浪漫主义激情不相容。赵树理看似朴素的“现实主义”创作有着丰厚的历史基奠，即传统民间社会中约定俗成的天然的社会伦理传统与“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建立的启蒙传统，而这两种传统却逐渐被日益构建成熟的新的文艺体系所淘汰。对现实生活经验的真实的反映与源于“五四”的对“问题”的质疑与探究精神也使赵树理对“现实性”产生真诚追求的愿望。这种“真诚”却不能容于对“革命激情”高度颂扬的潮流中。由“鲁迅方向”向“赵树理方向”的推进，给当时甚至后来的研究者一种错觉，认为由“鲁迅方向”到“赵树理方向”是一种精神上的断裂。在很长时间内的赵树理研究中，研究者基本上都一致认同赵

16) 林默涵著：从阿Q到福贵，原载《小说》1944年1卷第5期。

树理的创作与五四新文学传统是断裂的，他是由毛泽东《讲话》精神滋养而成一种新的文学创作方向。然而，这种表面呈现的现象并不能说明赵树理是与“五四”绝缘的。正如本文第一章所论述到的，赵树理与“五四”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联。在文化精神上，赵树理的文学创作精神与“五四”精神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赵树理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坚守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五四”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的。对“问题小说”的“五四”式探究并不是赵树理刻意执著追求的，也不是他与政策的最大冲突点。因此在解放区文艺界最初排斥“五四”启蒙的精英化叙述的潮流中，赵树理是被作为反叛“精英化”创作姿态的惊喜发现并树立起来的。赵树理所执著坚守并认定的“现实”是源于他对乡土自在世界的坚守与信赖的。建国后，随着党的文艺政策的成熟与坚定，赵树理不仅面对着无数批评，甚至也面对着自我的反省与焦灼。然而他依然竭力为自己申辩，为自己的文艺创作主张辩护。对《金锁》的一点辩护，正是他为自己“朴素现实主义”辩护的一种声音。

赵树理从第一次文代会到1955年《三里湾》发表的五、六年间，几乎没有有什么作品问世（充其量三个短篇，一个长篇），比起建国前创作超产期，作品产量实在太少了。对于“近三年来没有多些东西”，赵树理虽然总结了一些批评意见，但仍逃离不了对他疏离“农村生活经验”的自我批评。建国初期，赵树理在文学创作中的困惑，更多是由于赵树理对“朴素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坚守，及这种坚守面临着文化语境变化产生的冲突与焦虑。赵树理“朴素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必然暴露出一些现实“问题”与“革命现实主义”的要求产生巨大的冲突。从《三里湾》到《锻炼锻炼》等作品一路批判的声音正体现了这一点。实际上，赵树理对自己的“落后”也努力反思了，但他也许能够更正以“五四”问题视野观照现实的方式，却无法改变对农村生活经验的真实反映的习惯。《三里湾》中虽然刻意回避“问题”，却不经意间暴露出更多更严重的问题。以“革命激情”规约下的现实主义目光审视，这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因此，赵树理“熟悉农村”的经验式的写作受到质疑，他“努力赶上”的主观努力也成为泡影。虽然《三里湾》的结构和主题（肯定农村合作化经验）与周扬等人的要求吻合，却也遭到了激烈

的批评。《锻炼锻炼》看似是应时之作¹⁷⁾，但是这篇小說仍然违反了当时流行的“积极现实主义”¹⁸⁾的创作原则。赵树理50年代后期小說创作遭遇是源于赵树理坚守的“朴素现实主义”与50年代逐渐被文艺界提纯规约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冲突。50年代后期赵树理面对这种冲突显得更加无奈。他开始了“写实性”纪录式写作，放弃了“故事性”原则。这种创作格局的巨大变化在席扬的论述中有更加深刻的剖析。文章以“从1959年赵树理创作发表《老定额》开始，他在创作过程中的修辞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转折点，虽然这段分析是以“修辞”切入命题的，却也正体现了赵树理与当下流行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显著差异。赵树理从来没有主动迎合规约下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他焦灼在对“朴素现实主义”原则坚守中的困惑，困惑中的坚守之间。赵树理以讽刺和喜剧的笔法在《三里湾》等小說中展现出了最真实的乡村，是对农民和农村面对合作化运动真实状态的关注。

四、结语

不仅赵树理，同时代其他作家都以如出一辙的笔法书写“乡村”的美好图景。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被陈思和冠之以“民间文化形态”，在那个激流勇进的时代里，作者以平缓的语速，表达了农民改革的艰难，没有从阶级立场上对不想入社的“落后”农民进行批评和丑化；通过对“外来者”邓秀梅和留守干部李月辉的形象塑造，政策制度和乡村生活获得沟通和调和，这是作家对农民艰辛生活的深刻体会和对农民思想意识的深刻理解后所做出的尝试和努力。农村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整体，它与自然形态的中国社会及其文化

17) 作者把故事设定在“整风”时期，并借助整风的大字报形式揭开故事，也依靠“整风”的斗争氛围制服了“小腿疼”、“吃不饱”。

18) 席扬著：论赵树理与“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之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5月。“革命现实主义张扬的是‘积极的现实’的描写，而非‘消极的现实’的展示——如何描写‘消极的现实’，取决于作家的立场是否‘站在保卫社会主义社会的立场上’。”

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50年代转型时期作家们通过现实主义的演绎形成了各自的乡村世界。在这些作家笔下，“民间”的视角逐渐起到主导创作的作用，“乡村形象”被记里凸现和塑造起来。相比之下，城市形象则被封存在历史的尘埃里，不再字里行间流淌。

參考文獻

-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年。
-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年。
- 吴秀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上册),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2年。
- 金汉总: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年。
-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年。
- 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
- 吴秀明等:当代文学五十年,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4年。
- 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卷),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年。
- 董健: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Abstract

The Retirement of “City” and The Prominence of “Country” in Chinese Local Novels since 1940s

Zhu Ling

In the design and practice of soci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rural ecology” is often regarded as the opposite of “modern”, full of decadent, backward, ignorant, numb suffocating smell. And the hope of modernization is the city deduction, breeding. Therefore, the city and township of Chinese society have been divided into two worlds and two ecological circles. In the game between country and city since 1940s, it is obvious that urban ecology has been ignored or even denounced in literary works, while rural ecology has been beautified and highlighted. Rural ecology once put an end to the “farmers into the city” (especially young farmers) thought and signs, replaced by the face of land energy and enthusiasm of land reform and rural inherent human events in detail.

Key words : Chinese local novels, 1940s, retirement of “city”, prominence of” country

투 고 일 : 2018. 4. 10. / 심 사 일 : 2018. 4. 15.~ 2018. 5.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8. 5. 20.